

鳳凰出版社

作生平險側

范仲淹全集

不_上、故

史數仁贊

元人筆如揭伯
公之忠名
供為元人而
以



(清) 范能濬 編集 薛正興 校點

范仲淹全集

(上)

鳳凰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范仲淹全集/(清)范能濬編集;薛正興校點。
南京:鳳凰出版社,2004.11
ISBN 7-80643-462-3
I. 范... II. ①范... ②薛... III. 范仲淹(989~
1052)—全集 IV. Z424.41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04)第 026296 號

書名 范仲淹全集
著作權人 (清)范能濬編集 薛正興校點
責任編輯 薛正興
出版發行 凤凰出版社(原江蘇古籍出版社)
南京市中央路 165 號 郵編 210009
發行部電話 025—83223462
集團地址 江蘇出版集團
南京市中央路 165 號 郵編 210009
集團網址 凤凰出版傳媒網 <http://www.ppm.cn>
經銷 江蘇省新華書店
照排 南京理工排版校對有限公司
印刷者 江蘇新華印刷廠
南京市張王廟 88 號 郵編 210037
開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
印張 50.875
插頁 20
印數 1—2000 套
字數 1030 千字
版次 2004 年 1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標準書號 ISBN 7-80643-462-3/Z·44
定價 150.00 圓(全二冊)
(鳳凰版圖書凡印裝錯誤可向承印廠調換)

范仲淹全集前言

薛正興

范仲淹（九八九—一〇五二），字希文，蘇州人。北宋太宗端拱二年八月二十九日（九八九年十月一日）誕生于河北成德軍（即真定府，治所在今河北省正定縣）節度掌書記官舍。其父范墉時任成德軍節度掌書記。范氏先世，「始居河內，後徙於長安」^{〔一〕}。遠祖范履冰曾爲唐丞相、鸞臺鳳閣平章事。四世祖范隋，唐懿宗咸通二年（八六一）任幽州良鄉縣（今北京市房山區良鄉）主簿，後遷處州麗水縣（今浙江省麗水市）丞，舉家南遷渡江，「中原亂離不克歸，子孫遂爲中吳人」^{〔二〕}。「五代之際，世家蘇州，事吳越」^{〔三〕}。曾祖范夢齡，任吳越國蘇州糧料判官，「以才德雄江右」^{〔四〕}。祖范贊時，自幼聰穎，曾舉神童，位秘書監，曾匯集春秋泊歷朝史爲資談錄六十卷刊行于世。父范墉，「博學善屬文，累佐諸王幕府」^{〔五〕}，太平興國三年（九七八），隨吳越王錢俶歸宋，曾三任掌書記之職，爲成德軍、武信軍（即遂寧府，今四川省遂寧市）、武寧軍（即徐州，今江蘇省徐州市）掌書記。范墉原配陳氏，繼室謝氏，生有五子，三男早殤，惟范仲溫（九八五—一〇五〇）與仲淹存活，仲淹即謝氏夫人所生。范仲淹二歲時，父親范墉病故，年僅六歲的仲溫由族人帶回蘇州撫養。家道中衰，謝氏貧無所依，只得帶着幼孤

的范仲淹改嫁淄州長山（今山東省鄒平縣）朱文翰，改姓朱，名說，在朱家長大成人。朱文翰曾任澧州安鄉（今湖南省安鄉縣）知縣，終官淄州長山縣令，對繼子朱說「既加養育，復勤訓導」〔六〕，期成大器。仲淹不負厚望，青少年時已「慨然有志於天下」〔七〕，決心「讀天下書，窮天下事，以爲天下之用」〔八〕，留下了安鄉「書臺夜雨」、長山「劃粥斷鑿」而發憤苦讀的佳話。

大中祥符三年（一〇一〇），范仲淹入南京（即應天府，今河南省商丘市睢陽區）應天書院求學。「居五年，大通六經之旨，爲文章論說必本於仁義」〔九〕，「爲學好明經術，每道聖賢事業，輒跂聳勉慕，皆欲行之於己」〔一〇〕。他有一首睢陽學舍書懷詩，吐露了青年范仲淹的心聲。詩云：「瓢思顏子心還樂，琴遇鍾君恨即銷。但使斯文天未喪，潤松何必怨山苗？」〔一二〕論語雍也篇載，孔子稱贊顏回簞食瓢飲在陋巷，人不堪其憂，回也不改其樂。仲淹即以顏回爲榜樣，甘于清貧，以苦爲樂，磨煉意志；同時也渴望得到如鍾子期那樣知音的賞識，使他「以天下爲己任」的抱負得以施展。論語子罕篇載，孔子被圍于匡（今河南省長垣縣匡城），面臨危難，處之泰然，充滿自信地說：「天之未喪斯文也，匡人其如予何？」仲淹化用孔子的話，表達自己對前途充滿了信心；雖然「出處窮困」〔一二〕，「布素寒姿」〔一三〕，但相信終會像那「郁郁澗底松」〔一四〕那樣，立地參天，伸展「百尺條」，實現他濟世安民的大志。

大中祥符八年（一〇一五），范仲淹以朱說名舉，蔡齊榜進士。仲淹釋褐授廣德軍（今安徽省廣德縣）司理參軍，開始了他的仕宦生涯。司理參軍是掌管訟獄、審理案件的幕僚官。范仲淹秉公執法，認真辦案，「日抱具獄，與太守爭是非。守數以盛怒臨公，公未嘗少撓，歸必記其往復辯論之語於屏上，比去，至字無所容」（一五）。後人爲紀念范仲淹，建有范公亭。仲淹卒後二十年，高郵孫覺莘老知廣德軍，始以題范公亭詩記其事云：「蕭蕭獄曹掾，有亭名范公。歲月益已久，父老傳清風。維時狴牢下，枉直情畢通。太守異趣舍，挺然不曲從。事事爭救之，粉屏記其終。殆公三年歸，字滿無所容。官小俸祿薄，家居率窮空。賣馬以自給，徒行氣彌充。」（一六）孫莘老詩生動形象地述說了仲淹的初仕經歷。初仕廣德，仲淹即迎母侍養。但此時官小俸薄，家無長物，奉調離任時，「貧止一馬，鬻馬徒步而歸」（一七）。

天禧元年（一〇一七），范仲淹擢任文林郎，權集慶軍（即亳州，又稱譙郡，今安徽省亳州市）節度推官。推官掌刑事判牘，也是幕僚職。這年，仲淹奉母命歸宗復姓，在上表中引用范蠡、范雎的故事：「名非霸越，乘舟偶效於陶朱；志在投秦，入境遂稱於張祿。」（一八）范蠡去越隱于陶，改姓朱，人稱陶朱公；范雎入秦，改名張祿。這都是范氏改換他姓的事例，引典用事甚爲貼切。仲淹改爲范姓後，并沒有忘懷朱家二十多年的長育教誨之恩。宋張栻跋范仲淹與朱校理手帖墨刻云：「公雖以義還本宗，而待朱氏

備極恩意。既貴，則用南郊恩贈朱氏父，以及其諸子之喪，皆爲之收葬，歲時奉祀，則別爲饗。朱氏以公蔭爲官者三人，此載在遺事，世所知也。詳觀是帖，其親愛惇篤之意發於自然，蓋與待其本族何異，其於天理人情可謂得其厚矣。」〔一九〕仲淹對朱氏兄弟子侄，視同范氏家人，關懷備至，親密無間。今保存在范文正公尺牘中與朱氏書就有十五帖之多，殷切之情，溢于言表。仲淹後人與長山朱氏子孫，長期往來，歷代相傳。長山范文正公祠，直至清乾嘉年間，仍由朱氏子孫代爲承祀，不斷重修祠宇，春秋奉祀，傳爲美談〔二〇〕。

天禧二年（一〇一八），范仲淹漫游燕趙，「燕趙古稱多慷慨悲歌之士」〔二一〕，這裏也是仲淹的生身之地〔二二〕，于是有感而發，作河朔吟〔二三〕一首，抒發御戎之見。二十餘年後，仲淹以一名儒將鎮守西北，從他的文韜武略中，我們仍可感染到青年范仲淹河朔吟詩中的壯志豪情。

天禧五年（一〇二一），范仲淹調到泰州（今江蘇省泰州市），任西溪（今江蘇省東台市西溪）鹽倉監官，掌管鹽稅。乾興元年（一〇二二），上書執政張知白，毛遂自薦，傾述志願，「慨然有益天下之心，垂千古之志」〔二四〕，正如他西溪書事詩中所言：「卑栖曾未托椅梧，敢議雄心萬里途。」〔二五〕一百五十多年後，南宋愛國主義詩人陸游擊節高歌：「位卑未敢忘憂國」〔二六〕，表達了同樣的報國情懷。在泰州，范仲淹與時任泰州從

事的同年滕宗諒（九九一一〇四七）、隨父就讀于此的富弼（一〇〇四一一〇八三，弼父富言監泰州酒稅），意氣相投，揮斥方遒，結下了深厚的友誼，成爲莫逆之交。

天聖三年（一〇二五），范仲淹有奏上時務書，向皇太后和仁宗（一〇一三一一〇六三，一〇二三年即位）提出改革的意見，其主要內容爲：一、救文弊以厚風俗；二、整武備以御外患；三、重館選以養人才；四、賞台諫以開言路；五、抑賞延以清仕路，等等。仲淹當時位卑言輕，却敢冒死上書最高統治者，指斥時政。他所揭露的各種弊端，皆切中要害，成爲他日後推行慶曆新政的張本。在朝廷上下安享太平之時，仲淹已看到禍亂的萌芽，充滿憂患意識，主張居安思危，表現出一個政治家深謀遠慮的睿智目光和心憂天下的報國赤忱。

這年，范仲淹又積極上書給江淮制置發運副使張綸（九六二一一〇三六），建議盡快修復捍海堰。張綸報請朝廷批准，薦舉范任興化縣令，主持修堤工程。在首期工程中，范與滕宗諒同主其事，時值隆冬，氣候惡劣，驚濤洶涌，冲垮堤岸，工程受挫。但范仲淹不畏艱險，向上力陳修復堤堰的益處，得到淮南轉運使胡令儀（九六〇一一〇四六）、發運副使張綸的支持。在胡、張的主持下，次年八月再次興工，歷時三年，這條直貫通泰、楚三州、長達一百五十里的捍海堰終于屹立在黃海之濱。時仲淹以母老疾，辭興化縣職，「監楚州糧料院」，丁憂去官」〔二七〕。故仲淹云：「余始謀之，以母憂去職，二公（指胡

令儀、張綸)實成之。」〔二八〕此爲實話，充分體現了范仲淹實事求是、謙虛謹慎的品格。由范仲淹首倡修復堤堰，當地人民後來便將這捍海堰稱作范公堤，并建范公生祠。宋楊畫像贊云：「青衫下僚，名世高節。捍患御灾，豈不在余？」又云：「我思范公，水遠堤長。」〔二九〕對於情繫民衆、興利除弊、造福一方的范仲淹，人民永遠不會忘記，正如六百多年後清初東台鹽民詩人吳嘉紀范公堤詩云：「茫茫潮汐中，硯硯沙堤起。智勇敵洪濤，胼胝生赤子。西塍發稻花，東火煎海水。海水有時枯，公恩何日已？」〔三〇〕

天聖五年（一〇二七），晏殊（九九一—一〇五五）出守南都，辟丁母憂居此的范仲淹執掌應天府教席。據宋司馬光涑水記聞卷十載：「晏公請掌府學，仲淹常宿學中，訓督學者，皆有法度，勤勞恭謹，以身先之」；「出題使諸生作賦，必先自爲之，欲知其難易，及所當用意，亦使學者準以爲法」。范仲淹的教育思想和教學方法，至今仍有着積極的啓示作用。在守母喪期間，范仲淹「冒哀上書，言國家事，不以一心之戚，而忘天下之憂」，寫下了上執政書。他針對當時形勢，看到了太平盛世下的內外隱憂，指出「窮則變，變則通，通則久。非知變者，其能久乎？」提出了「固邦本，厚民力，重名器，備戎狄，杜奸雄，明國聽」的六條改革主張。上執政書是前兩年奏上時務書的擴充和發展，其中提出問題最突出最迫切的是第一條，即「固邦本者，在乎舉縣令，擇郡守，以救民之弊也」。十餘年的地方基層幕僚經歷，使范仲淹對地方吏治的腐敗有了較深的了解，整頓

地方政府成爲他主張澄清吏治的重要方面。由此可見，范仲淹思索的改革主張正在逐步充實、豐富和發展，他以整頓官僚政治體制爲中心的改革思想已初步形成，爲以後的慶曆新政改革方案打下了基礎。宋潛說友云：「公在天聖中，遺宰相書無慮萬言，經濟規模，大抵略見。其後爲牧守，爲將帥，爲執政，平生所爲，無出於此，蓋言之必可行也。」〔三一〕時宰相王曾（九七八—一〇三八）對上書極爲賞識，遂提示晏殊薦舉仲淹應學士院試。天聖六年（一〇二八）十二月，守喪期滿的范仲淹被召爲秘閣校理，從此躋身館職，擔任京官。

天聖七年（一〇二九），范仲淹上書諫仁宗不可在殿廷率百官行拜太后壽儀，認爲「天子有事親之道，無爲臣之禮，有南面之位，無北面之儀」，「虧君體，損主威，不可爲後世法」〔三二〕。接着又上疏請太后「卷收大權，還上真主」，讓「春秋已盛」的仁宗親政〔三三〕，疏入不報，遂自請補外，出爲河中府（即蒲州，今山西省永濟市蒲州）通判。時朝廷方建太一宮及洪福院，仲淹上疏諫：「今又侈土木，破民產，非所以順人心、合天意也。宜罷修寺觀，減常歲市木之數，以蠲除積負。」〔三四〕又據河中府戶口稀少、吏員冗多之現狀，上疏要求撤并州縣，以便「吏役稍減，農時不奪，地利無遺，民財可阜」〔三五〕，同時也可精簡吏員，減省開支，以寬民力。作爲慶曆新政中的減徭役、并州縣，正發端于此。天聖九年（一〇三一），仲淹遷太常博士，移任陳州（即淮寧府，今河南省淮陽

縣)通判。

明道二年(一〇三三)，劉太后鶴駕西歸，仁宗親政，范仲淹被召回任右司諫。一些原先受太后壓抑的官員得到升擢，其中有人往往追斥太后垂簾時事，范仲淹則上言：「太后受遺先帝，調護陛下者十餘年，宜掩其小過，以全后德。」〔三六〕上大感悟。這有助于朝廷政局的穩定，是仲淹識大體，顧大局，敢言直諫，恪盡臣責的表現。是年，江淮、京東災傷，仲淹奏請遣使巡行，并云：「官掖中半日不食當何如？今數路艱食，安可置而不恤？」〔三七〕八月受命安撫江淮，所至開倉廩，賑乏絕，禁淫祀，奏蠲廬舒(廬即廬州，今安徽省合肥市；舒即舒州，今安徽省安慶市)折役茶、江東丁口鹽錢。仲淹還將太平州(今安徽省當塗縣)飢民所食烏昧草進御，奏請宣示六宮貴戚，以戒侈心。又上陳八事疏，提出了切實可行的救弊措施。是年十二月，仁宗廢黜郭皇后，仲淹與中丞孔道輔(九八六—一〇三九)率諫官、御史伏閣諫，仁宗貶道輔知泰州，貶仲淹知睦州(亦稱桐廬郡、建德府、嚴州，今浙江省建德市梅城鎮)。

景祐元年(一〇三四)，仲淹出守睦州。在富春江邊，憑吊嚴子陵釣臺，重建嚴先生祠堂，并寫下了傳世名篇桐廬郡嚴先生祠堂記，贊揚嚴子陵「高尚其事」的高風亮節，「而使貪夫廉，懦夫立，是有大功於名教也」。篇終以歌作結：「雲山蒼蒼，江水泱泱，先生之風，山高水長。」同年八月，仲淹移蘇州。到任時，正值蘇州地區暴雨成灾，仲淹即

往常熟、昆山等地查勘水情，「疏五河，導積水入海」〔三八〕。回到蘇州，又忙于「夙夜營救」十萬戶災民〔三九〕。公務之餘，關心地方教育事業，捐獻南園宅地設立州學，并請名儒胡瑗（九九三—一〇五九）首當師席。從此，吳學甲于東南，在中國教育史上傳為佳話。

景祐二年（一〇三五）三月，范仲淹升為禮部員外郎、天章閣待制，躋身侍從之列。八月，判國子監進京。仲淹論事益急，時相忌之。「乃命知開封府，欲撓以繁劇，使不暇他議，亦幸其有失，即罷去」。仲淹精于政務，「京邑肅然稱治」，故京城民謠云：「朝廷無憂有范君，京師無事有希文。」〔四〇〕景祐三年（一〇三六），范仲淹上百官圖，指斥宰相用人不當，又上帝王好尚論、選賢任能論、近名論、推委臣下論四論，譏指時政。宰相呂夷簡（九七九—一〇四四）大怒，反訴范仲淹「越職言事，薦引朋黨，離間君臣」〔四一〕，范落職知饒州（今江西省波陽縣）。這是范仲淹第三次因諫諍而被貶出京。余靖（一〇〇〇—一〇六四）、尹洙（一〇〇一一—一〇四七）挺身論救，相繼貶外；歐陽修（一〇七一—一〇七二）致書右司諫高若訥，斥其不能主持公道論救仲淹，反而私下惡語詆誚，「是足下不復知人間有羞耻事爾」〔四二〕，修被貶任夷陵（今湖北省宜昌市）令。蔡襄（一〇二二—一〇六七）以此為題材，憤而寫下一首「四賢一不肖」的諷諭詩。「四賢」譽仲淹、靖、洙、修，「一不肖」斥高若訥。朝野傳誦，士論壯之。韓琦（一〇〇八—一〇七

五)、蘇舜欽(一〇〇八—一〇四八)等，亦抗言上疏，聲援「四賢」。仲淹臨行前，朝士爲避「朋黨」嫌名，前往送行者唯有李紘和王質(一〇〇一—一〇四五)。王質扶病祖宴都門，獨留語累夕。有大臣云：「子有疾可辭，何爲自陷朋黨？」答云：「范公天下賢者，質何敢忘之？若得爲其黨人，公之賜質厚矣。」聞者爲之縮頸^(四三)。朝廷中的這一場政治風波，史稱「范呂黨爭」，宋代的黨爭即由此肇其端。

早在第二次被貶知睦州時，范仲淹就說過「理或當言，死無所避」；「既竭一心，豈逃三黜？」^(四四)正是不幸而言中，兩年後即第三次被貶而知饒州。仲淹上表云：「然而有犯無隱，惟上則知；許國忘家，亦臣自信。」又云：「動靜三思，始終一志。」^(四五)即使再黜三黜，仍然是一心一志，無怨無悔。在饒州，仲淹經實地調查，奏免了已不產銀的德興銀山銀冶場的貢課，又奏免了向朝廷進貢的饒州烏銜茶。宋李深題范文正公祠堂詩云：「一章奏免烏銜茶，惠及饒民幾萬家。遺老至今懷德政，爲余談此屢咨嗟。」^(四六)

景祐四年(一〇三七)十一月，仲淹調知潤州(今江蘇省鎮江市)。赴任途中，經江西彭澤，謁唐名臣狄仁杰祠，「慨慕名節」，爲之作記立碑。在潤州，仲淹整頓擴建了州學，重建清風橋，後被改稱爲范公橋。寶元二年(一〇三九)三月，仲淹調任越州(即紹興府，今浙江省紹興市)。在越興辦教育，建立州學；寫下清白堂記：「予愛其清白而

有德義，爲官師之規。」倡導爲官要「清白」，對民「有德義」。這是范仲淹對官吏的基本要求，也是他一直主張改革時弊、整頓吏治的重要動因。後人因稱清白堂之井泉爲范公泉。

康定元年（一〇四〇）正月，西夏元昊（一〇〇三—一〇四八）大舉進犯，先攻取延州（今陝西省延安市）西北面的金明寨，虜宋守將李士彬，接着連破安遠、塞門、永平諸寨，兵臨城下。增援延州的宋兵在三川口陷入重圍，宋將劉平戰死，石元孫被俘，宋兵全軍覆沒，邊境告急，朝野震驚。在這危急的形勢下，陝西安撫使韓琦力薦范仲淹。三月，詔命仲淹復天章閣待制，知永興軍（今陝西省西安市）。范仲淹三落三起，臨危受命，「一聞邊烽動，萬里忽爭先」^{〔四七〕}，立即從越州奔赴西北戰場。四月，赴任途中，改任刑部員外郎、陝西都轉運使。五月，又升任龍圖閣直學士、陝西經略安撫副使。八月，仲淹自請代張存兼知延州。「公爲將務持重，不急近功小利，於延州築青澗城，墾營田，復承平、永平諸寨，屬羌歸業者數萬戶」^{〔四八〕}。范仲淹從戰地實際出發，改革軍隊編制和作戰方案，實行「將兵法」，量敵多寡，靈活出擊，積極防禦，士氣大振，以致西夏軍私相告誡云：「無以延州爲意，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甲兵，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。」^{〔四九〕}大范，指范雍。老子，西夏人稱知州。是歲，青年張載（一〇二〇—一〇七八）來謁，有投筆從戎之志，仲淹勸以讀中庸，後刻苦力學，攻堅破滯，卓然名家，成爲關

學開宗立派的一代宗師。

慶曆元年（一〇四一），由於仁宗急于結束戰爭，朝廷采用韓琦、尹洙所上政策，以求速戰速勝；而仲淹則主張「屯兵營田，作持久之計」^{〔五〇〕}二月，元昊向渭州（今甘肅省平涼市）進軍，韓琦命任福領兵出擊。任福輕敵，貪功冒進，于好水川（今寧夏回族自治區隆德縣好水鄉）陷入西夏重兵設伏的「口袋」，宋軍全線崩潰，任福戰歿。^{〔韓琦因敗軍之罪，被貶知秦州（今甘肅省天水市）。而范仲淹則因與元昊通書，觸犯了「人臣無外交」的禁條，被降職戶部員外郎，知耀州（今陝西省耀縣）。仲淹受罰，不改初衷，上表云：「苟利國家，不恤典憲，宜及於禍，以貽厥羞。」〔五一〕八百餘年後，清代民族英雄林則徐有詩云：「苟利國家生死以，豈因禍福避趨之？」〔五二〕抒發了同樣的報國情懷。}

五月，仲淹徙知慶州（今甘肅省慶陽縣），兼管勾環慶路都部署司事。十月，分陝西爲秦鳳、涇原、環慶、鄜延四路，以韓琦、王沿、范仲淹、龐籍（九八八—一〇六三）分領四路軍事。十一月，仲淹奏上攻守二策狀^{〔五三〕}，全面闡述了他的「用攻則宜取其近，而兵勢不危；用守則必圖其久，而民力不匱」的積極防禦的戰略思想和方針政策。

慶曆二年（一〇四二），仲淹奏上再議攻守疏^{〔五四〕}，「請復諸寨爲守禦之備」，「守以土兵則安」；「於守策之外，更備攻術」；「招納之策，可行於其間」。三月，興築大順城，以據要害。後又城細腰，復胡蘆諸寨，招明珠、滅臧二強族及近羌千餘帳內附，自此環

慶屬羌悉爲宋用。閏九月，元昊軍攻鎮戎軍（今甘肅省鎮原縣），曾被范仲淹斥責爲「猾懦不知兵」的葛懷敏率兵迎戰，行至定川寨（今寧夏回族自治區固原縣西北中水河），陷入重圍，葛懷敏戰死，宋軍陣亡近萬人。西夏軍乘勝直抵渭州，大肆虜掠，關輔人心搖動。仲淹連夜領兵赴援，耀兵關下，號令嚴明，威震戎落，人心遂安，而相賀曰：「邊上自有龍圖公爲長城，我屬何憂？」（五五）仁宗命加官進職，與韓琦并除樞密直學士、右諫議大夫。十一月，宋復署陝西四路都部署，以范、韓、龐籍分領之，并兼四路招討使。又據仲淹上表奏請，命韓、范並駐涇州，與駐延州的龐籍成犄角之勢。又奏請文彥博（一〇〇六—一〇九七）知秦州，滕宗諒知慶州，張亢（九九九—一〇六一）知渭州，并分別兼秦鳳、環慶、涇原三路帥臣。「會挽雕弓如滿月，西北望，射天狼。」（五六）經過近三年的戰事，西北前線將領從實戰中認識到范仲淹積極防禦戰略的積極意義，「天子由是益信公智謀過人遠甚」（五七），于是終於形成了一個由范、韓、龐籍爲首的團結一致、堅強有力的指揮中心，構築起陝西四路「首尾相應」的西北邊陲攻守體系。軍中爲之語云：「軍中有一韓，西賊聞之心骨寒；軍中有一范，西賊聞之驚破膽。」（五八）

慶曆三年（一〇四三）四月，范與韓并除樞密副使。八月，擢范仲淹參知政事。九月，開天章閣，召二府條對，仲淹奉詔，奏上答手詔條陳十事，又上再進前所陳十事，後一疏實際就是前一疏的匯報提綱（五九）。仲淹在上疏中開宗明義提出：「歷代之政，久

皆有弊，弊而不救，禍亂必生。」主張周易所言：「窮則變，變則通，通則久。」又指出，宋立國以來已八十餘年，「綱紀制度，日削月侵，官壅于下，民困于外，夷狄驕盛，寇盜橫熾，不可不更張以救之」。仲淹疏中所陳十事，就是慶曆新政的總綱，其要旨是：一曰「明黜陟」，即重定文武百官的磨勘方法，嚴于考績，將以約濫進，責實效，提高行政效率。二曰「抑僥幸」，限定大官僚的「恩幸」特權，不得爲子弟陳乞館閣職事，將以革濫賞，省冗官。三曰「精貢舉」，改變專以詩賦墨義取士的舊制，主張取士先德行，次藝業，將以正教化，育人才。四曰「擇官長」，嚴格選擇地方各級官吏，將以正綱紀，去疾苦，救生民。五曰「均公田」，各級官吏按等差給以「職田」，用來責其廉節，使天下政平，百姓受益。六曰「厚農桑」，提倡各地興修水利，行勸課之法，將以救水旱，豐稼穡，增國力。七曰「修武備」，在京畿內并近輔州府召募民兵五萬，以助正兵，捍衛朝廷。使三時務農，一時教戰，兵農合一。此實強兵節財之要，全國各地仿此施行。八曰「減徭役」，撤并州縣，「其鄉村耆保地里近者，亦令并合」，以減少徭役，降低行政成本，減輕百姓負擔。九曰「覃恩信」，朝廷赦書中及民之事，各地務必照辦施行，以取得百姓信任。十曰「重命令」，各地法令應由朝廷統一，頒行後務必貫徹執行，嚴懲違抗中央政令的失職官吏。所陳十事，朝廷基本予以采納，除「修武備」一項外，其餘九項從十月始，就以詔令形式接連頒行全國。